

03/02/31



△辛亥前，孙中山先生在西欧各国多次与中国留学生会晤，宣传革命。图为1905年中山先生在布鲁塞尔与留学生合影。右后为石瑛，其余诸人为朱和中、魏震记、胡竞柯。（严建培 复制）

▽1938年石渠任湖北省建设厅长期间，与张难先书信联系，商谈鄂西治安、公路建设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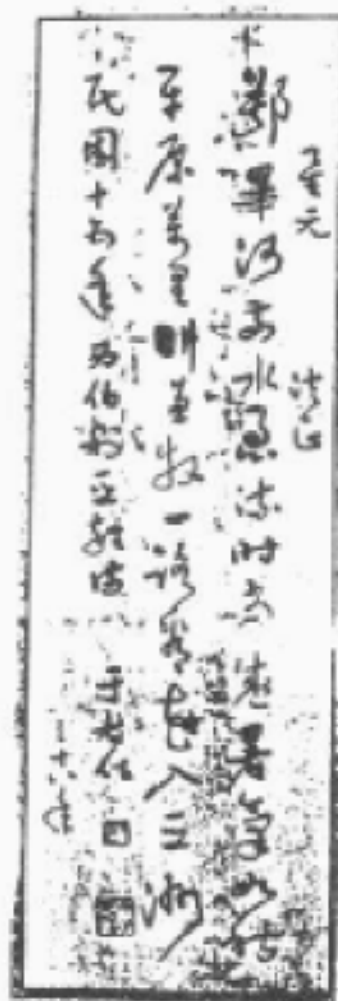
(严越培 复制)

義公道席。四核子書敬悉一切。鄂西經濟問題治方問題俱不無可慮之處。立三先生未嘗不至見於此。但恐知之未必甚詳。且大率小亦寡在。一面轉請上台应付不了。以致有所見者所知不能迅速見諸實行。誤以為經濟急須推展。聚資增加生產。鄂西人口日增。非向省定之二十萬九萬五萬一萬就二十萬先將此等年局應施。庫房發給。二萬餘元。建始金庫發公八千餘元外。這庫房發給。放此次發給民衆什物。共計二百餘元。不敷一用。必當妥議以支。此其一也。一則鄂西對於去歲水災也。立三先生曰。日假使政府欲助鄂西。則石碼已如成數人。此地好幾十方丈。及同至工程師是已付地價。或議定地價。則一味板結。古上頭命令而不下。此其洗油缺乏車輪難求。日漸減少。似不必再遲遲到申。請以為敵機試驗炸彈之用。拉脫法更速。集兵區之地價仍必不致先付。或議定以免人民懸望。乃為激責全具。使用壓力阻止地主索償。此種舉動誠令六百思不伯其辭故也。

公決赴宜一走。甚好。赴程之前一日。坐船抵三。以靈活足示港務。即次

年石碼松 三九

身石煥然 三九



①1949年于右任先生赴台过港与旅港同胞合影。前排左起巫云凤、于右任、于媳。后排左起高文洲、于鹏、胡星元、郭大风、郑某。（严越培 复制）

②解放后的协和医院。（赵子阶摄影）

③三北轮埠公司旧址。今沿江大道116号。（赵子阶 摄影）

④于右任先生1926年（民国15年）赴苏联考察时作七绝一首：1949年过港赠胡星元先生。

鄧平河前水急流，时当盛暑气如秋。
平原万里耕兼牧，一路看花入亚州。
（赵子阶 摄影）（严越培 复制）

1	
2	4
3	

一九八七年第四辑 (总第30辑)

抗战纪事	人	物
冈村宁茨投降时的嘴脸	张振国及其同伙	陈诚军事力量在武汉的兴起
保卫武汉中我在海军作战的经过	杨永泰反共亲日的几种表现	陈诚、严立三与湖北省政
缅甸夺囊战纪实	在武汉十个月的杨永泰	陈诚治理湖北的几项措施
在日军宪兵队九十九天	武汉工商界钜子贺衡夫的一生	我的保定军校同学严立三
	深切怀念邹韬奋先生	抗战时期的石璞先生
	于右任先生去台过港书幅寄情	附：石璞先生年表
	胡忠民与石璞	
	王冠梅	陈
	郭大风	蓝
	陈羲伯	师
	吕娘芬	李
	许士奇	树
	匡侯	荪
黄斌亭	任继昉	谈
刘绍邦	许鄂昭	慕
江家骅	蓝香山	中
荷戟	陈	岳
98	67	1
100	64	6
104	61	20
108	56	29
	36	



武汉文史资料 季刊

补遗	社会百态	文化丛谈	宗教剪影	交通史话	鉴往篇	政坛忆旧
《孙惠卿与刺激疗法》补遗	抗战期间的汉口日租界 黄陂城外「好吃街」	鲁寿安先生与鸾亭小学 协和医院今昔 回忆骨伤科名医李荣山	汉口佛教居士林 武汉市佛教（补白小资料）	三北轮埠公司在汉口的经营活动 屠鼎芳 夏榕卿	解放前汉口市的各种选举见闻录 黄陂县国大代表竞选内幕	湖北将军团及其垄断的公共企业 我们所知道的将军团 改组派在武汉 湖北革命同志会
柏钟扩	喻保明	袁继成 梅竹青	李白贞	屠鼎芳 夏榕卿	程立顺 刘明远	孙刚 喻育之 柏楨 李余三 马毓英
185	182 172	166 158 155	154 149	139	133 129	123 121 117 111

陈诚军事力量在武汉的兴起

慕中岳



(一)

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接着举行了全国范围的“编遣会议”。会议决定，把四个集团军所属的方面军、第几路军、军等指挥机构撤销，改以师为战略单位。因为各集团军的师数不等，大约为六至十三个师，所以编遣会议开的极不顺利，争争吵吵，没有达成预定的协议。这也是造成1930年军阀之间大混战的原因之一。

第一集团军原辖十三个师，钱大钧为第三师师长，陈诚为十一师副师长。1929年，蒋桂战争中，桂系失败。蒋介石到武汉后，将原桂系胡宗铎、陶钧在武昌办的随营学校，改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蒋兼校长，派钱大钧为教育长，主持校务。学生来源大部分来自中学毕业生和一部分胡宗铎、陶钧十八、十九军的下级干部。

钱大钧在第三师任职期内，待人宽厚，无官僚习气，因而颇

得大部分官佐的爱戴。过去在第三师任过职的官佐，大都乐于汇集武汉。所以武汉分校的总队长、大、中、区队长，以第三师来的人较多。

这年10—11月间，武汉分校成立第一个教导团，钱大钧保举曾在三十二军任团长，有战功，改编后任第三师十五团中校团附（副团长）的吴继光（黄埔二期）为团长。蒋介石规定部队保举团长以上军官，都要经过召见谈话，决定后才能正式发表。钱保吴为团长，蒋来电召见，及见面时，首先问吴：“你在军队操课之外，看些什么书？”吴答说：“每日训练官兵外，有空隙即看战斗纲要和战术等书。”蒋听了后十分不满，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并继续说：“当营团长，不阅读《曾胡治兵语录》，看战术等书有什么用？”吴继光的团长也就没有批准，改派张世希（黄埔一期）为团长。吴则任第二营中校营长。此时第十一师师长曹万顺，调新编第一师长；陈诚则由副师长，升任师长。这时武汉分校教导团由一个团，扩充到四个团。

1930年中原混战前夕，南京中央军校所属的“教导队”等部队和警卫部队的部分，编成为教导第一师、第二师，武汉分校的四个教导团则编成为教导第三师。同年6月后又成立两个团和三个补充团。凡在第三师任连长的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到教导第三师的都是从连长干起，只有我是在第三师任连长，到教导第三师直接升任营长的。因而不免引起不少同期同学的瞩目和私议。部队在成立，招兵等事务中，由于我的成绩尚好，大家也就无话再说。中原战事结束，教导第一师改为国民政府警卫师，教导第二师改为第四师，教导第三师改为第十四师。第十四师的师、旅主要干部是：

师长钱大钧，参谋长薛练；

第四十旅旅长李正仙，第四十一旅旅长李及兰，独立旅旅长李延年。

(二)

1930年中原混战期间，陈诚由于枪毙作战不力的六十一团团团长刘天德，与刘峙发生了矛盾。十一师于济南之战和克复郑州，取得比较显著的战功。战争结束，刘峙升任河南省主席，陈诚的十一师迅即由京汉铁路车运南下，开赴岳州，分驶汨罗江到武昌各重要车站。蒋介石论功行赏，以钱大钧没有到前方参与战事，所属教导第三师，仅有三个团编成的一个纵队，参加过攻克山东肥城之战，加上师和分校在经理经济手续上也有些不够清楚的地方，第十四师师长职就被免去。陈诚由十一师转任十四师师长，十一师师长职则由副师长罗卓英升任。当时正值蒋介石在中原战争遇到山东、河南等地阎、冯联军的抵抗，消耗很大兵力。攻城战斗，一般部队又难以胜任，需要成立新的攻城部队，担任将来战争时的攻城任务。囑意以教导第三师的三个补充团改为攻城旅。指定第九师二十六旅旅长李延年为旅长。

陈诚于1931年元月中旬，由岳州到武昌黄土坡十四师师部就职。他一到差首先将八十三团团团长张良莘免职。把李延年由第九师带来的张璪任团长。其次是调八十一团团团长张达为攻城旅副旅长，八十一团团团长遗缺以武汉分校大队长方天升充。接着批准第八十二团团团长张本清的长假，以十四师学兵营营长吴继光升充。攻城旅由三团合编为两团。第一团团团长梁凯，调南京总司令部候差。三个补充团九个营长保留六个，两个降为营附，一个调任师部附员。仅只一个月时间，陈诚就大刀阔斧撤换了四个团长，三个营长，这就引起全师官佐群情骇然。十四师作了团长级的更动，独立旅改为攻城旅，团营建制也随着起了变化。

蒋介石于同年5月上旬升任陈诚为十八军军长，军属师旅。除陈诚自兼的十四师和罗卓英的十一师外，攻城旅配属与否，成了陈诚与李延年的尖锐矛盾。攻城旅的全衔是“陆海空军总司令

部攻城旅”。李延年又为蒋介石所信任，能征惯战的黄埔第一期生，攻城旅不应属于十八军的建制，而应独立，直属于总司令部。陈诚则认为攻城旅的两个团，是由十四师独立旅改的，番号虽改，仍属十四师，更应归十八军的建制。陈、李间的明争暗斗，直到11月李延年他调才告结束。武汉当时驻有三个炮兵团，其中以李伴奎年资较深，陈诚就把李升为炮兵第二旅旅长，统率这三个炮兵团。李伴奎的炮兵团，由陈诚另派人接充。这个旅的番号和攻城旅一样：“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炮兵第二旅”。炮兵旅仍然是被列入十八军的建制。第十八军于1931年5月中旬，在武昌成立。属于这个军的师旅长，及其重要官佐名录如次：

第十八军军长陈诚。

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副师长李明；第三十一旅旅长张鼎铭，第三十二旅旅长萧乾，独立旅旅长霍揆彰。

第十四师师长陈诚，副师长周至柔，第四十旅旅长夏楚中，第四十一旅旅长李及兰；攻城旅旅长李延年，副旅长张达；炮兵第二旅旅长李伴奎。

(三)

第十八军于6、7月间开赴江西，陈诚乘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在兴国高兴圩受到红军沉重打击后，乘机拿取这个师的番号和经费，把攻城旅和十一师的独立旅，合编成新的五十二师。陈诚自兼师长。十四师则由副师长周至柔升充。同时借口驻永丰的五十九师川军张英部，纪律不佳，予以改编，转调第六师的旅长陈时骥为师长。原属于孙传芳旧部的四十三师，在第三次“围剿”战斗中，打了败仗，此时驻吉安以北的峡江县，陈诚也把它兼并，他由五十二师兼师长转为四十三师兼师长。五十二师师长则由十一师副师长李明升任。到当年底十八军所属的五个师的师长是：

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

第十四师师长周至柔；
第四十三师师长陈诚（兼）；
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
第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

陈诚于1931年，一年之内由一个师扩大为五个师，并四兼师长。当时师的人事经费名义上属军事委员会和军政部，可是都由十八军转领转发，因而人事经济完全操持掌握于陈诚之手。有这样雄厚的人力物力，不仅当时蒋介石系统内无人能与比肩，其他非嫡系的广东、广西、四川、山西、东北等地方部队，更加瞠乎其後。陈诚凭这部军事力量，长期影响全国重大政治和军事的动向。直到全部大陆解放时期，才算告一段落。

作者黄埔四期生，曾任国民党六十九军副军长。

陈诚、严立三与湖北省政

谈 瀛

(一)

抗战发生后，随着上海的失陷，南京政府的迁移，国民党中枢军政重心转到了武汉。武汉成了全国抗战的临时首都，同时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高潮的中心。蒋介石亲驻武汉。在蒋之下，国民党军政方面最当权，最活跃的风云人物，要数陈诚。他一身兼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武汉卫戍总司令、三青团中央书记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等要职。1938年6月，湖北省政府战时第二次改组，陈诚还兼上了湖北省主席。

蒋用陈诚兼领湖北省政，主要出于用人唯亲，犖犖之下，可以推心置腹。同时，蒋要控制湖北这个冲要之地，又不得不从湖北人士的安排上面加以考虑。抗战以前，陈诚任陆军整理处处长，常驻武昌南湖，还兼任宜昌行辕主任，往来宜汉之间，并不是人地生疏。尤其重要的是，长期以来陈诚与湖北知名人物严立三初则极为深切，后又变为十分微妙的关系，而这位严立三在湖北省政府改组的棋盘上，此时正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抗战发生后，严的出处进退，既关系到蒋与湖北地方爱国力量的合作，同时还可能对全国各界——尤其是蒋军内部黄埔系的视听，造成影响。

蒋介石历来对湖北人没有好感。1932年，蒋到武汉督战反

共，在一次大会上大骂“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当时曾引起湖北各界人士的公愤。蒋介石还对其左右亲信授意，不可让湖北军人掌握兵权。抗战爆发了，情况发生了变化，团结人才共赴国难的呼声更高了，调动辛亥首义之地的积极因素来适应当地军事冲要的武汉地位，已成为与抗战大计迫切相关的议题，对于人望所归的严立三、张难先、石瑛，如何安排，蒋介石就不得不重新考虑了。

1937年10月初，蒋电邀严立三赴南京，请严出山参加抗战。严立三以大敌当前，请蒋派他上前线，愿战死沙场。蒋派严以督战的名义，前往淞沪，协调前线作战部队将领间的关系。严到上海时，我军在劣势装备，浴血苦战和指挥失误的情况下，正在溃退，已不可收拾了。严回南京，向蒋复命。蒋即要严回湖北主持省政。严谦让为怀，推给何成濬，并表示自己愿竭力襄助。于是，同年11月下旬，蒋通过行政院下令改组战时的湖北省政府，任何成濬为省主席，严、张、石同时任省府委员，严兼民政厅长，石兼建设厅长。

可是，蒋到武汉后，对湖北这个局面还是不放心的。西安事变中，何成濬拒绝张学良的邀请，不去西安，与何应钦串通一气，推动内战，企图从中窃取更大的权力。因此，何早已失去了蒋的信任。何再任省主席，自己仍然不能振作有为，重用杨揆一为省府秘书长，杨想大权独揽，事事与严、张、石立异，以致省府内部不能和衷共济。石瑛历来反对汪精卫，两人势如水火，汪出于打击报复，在一次国防最高会议上指摘湖北战时公路失修，要追究责任。这就给蒋提供了再改组湖北省政府的借口。用陈诚兼领湖北省政，既可使地方行政实权不致完全落入湖北人之手，又可以运用陈诚与严立三的历史关系，挽留住严，还可以通过严与张、石的友谊关系，挽住张、石同时留任。这样就可以给人们造成一个蒋对湖北名流推诚合作、共赴国难的印象。这是出于蒋

的深思熟虑。

话要回到陈诚与严立三的历史关系上面来。陈诚于1922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分发浙江陆军第二师第三旅五团三营见习，补少尉排长，郁郁不得志，不安于位。这一年，邓演达从广东到上海，招致保定军校毕业同学。陈诚应召，随即赴粤。邓任粤军第一师团长，派陈充连长。由于邓演达与严立三（当时名严重）为刎颈之交，所以陈诚对严十分亲近，十分尊重，称严为老师。在东江讨伐陈炯明的战役中，陈受轻伤入院，得电报父亲病故，回原籍青田高市奔丧。妻吴氏疑陈在穗另有所欢，用剪刀刺喉自杀，虽经救治未死，但陈却因家庭连遭变故，思想消极，不愿再去广东部队中吃苦了，亲去杭州求见浙江省长夏超，想在警界谋一职位，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遭夏超的冷眼。想仍去广州，又已超过了假期，进退狼狈之中，忽萌自杀之念。恰巧在这个生死关头，收到了严立三的来信，慰勉备至，促他速返广东。这样，他才振作精神，重赴广东工作（这段故事，是1941年我在长沙办报时，亲闻于第九战区政治部主任郑炳唐的。郑也是浙江青田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北伐时期，曾任二十一师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调黄埔军校任职后，严立三同时到黄埔军校，陈诚随之，任上尉教育副官，后调升炮兵队区队长。北伐初期，严立三任二十一师师长，陈诚由营长擢任团长，攻入浙江后，又经严力保擢升该师副师长。1927年，宁汉分裂，邓演达在武汉激烈反蒋。因严邓之间常有函电往还，以致加深了蒋对严的疑忌。严愤而称病向蒋提出辞职，蒋问：“谁可继任？”严答：“陈诚可以。”蒋知道陈诚是浙江青田人，欣然同意。陈诚于是接替了严的师长职务。龙潭战役中，陈因患胃病，坐轿子上前线督战，被何应钦予以免职处分。在蒋下野期间，严到南京出任军务厅长，又保陈诚任副厅长。1928年后，严氏退出军政界，隐居庐山，陈诚则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扶摇直上，对于严氏仍然

保持书信往还，有时还亲到庐山访问，表示关切。“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邓演达被捕，严立三曾托人致意，责成陈诚向蒋进言，尽力营救。邓终于被蒋杀害了，严对此极为痛心，可是仍然与陈诚保持友谊。

在陈诚方面，除了出于对严人品学问的尊重以外，还有其现实的原因：一则是接受了蒋介石的授意，一则是为了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严在黄埔前数期学生中的威信高过于蒋，为了维系黄埔系的人心，不得不对严表示宽容。严在二十一师旧部中的威信高过于陈，严任二十一师师长时，罗卓英任该师参谋长，林蔚任旅长，周至柔任团参谋长，这班人后来都成了陈的心腹、股肱，林蔚且深入蒋幕。陈为了巩固自己的阵脚，为了对黄埔系争取好感和缓和矛盾，更不得不挟严以自重。邓演达未死以前，蒋把邓看成是他在政治上的劲敌，欲得而甘心。邓被害以后，蒋对邓领导的第三党，还是放心不下，仍在继续进行瓦解和收容的阴谋活动。蒋把拉拢、收罗第三党头面人物的任务交给陈诚。严立三与邓演达的死生不渝的交谊，蒋知之最早，陈知之最深。严在庐山太乙峰的住宅，就是邓早年购置的。邓死以后，修墓、立嗣，都是由严出面主持的。严、邓之间的交谊本末，昭昭在人耳目。陈对严的礼貌周旋，醉翁之意或不全在酒，而在于借匡庐的烟雾迷惑若干邓的追随者和同情者的视听。在西安事变中，闲云野鹤的严立三，忽然在蒋介石的棋盘上出现了，而且增值了。由于张学良将军苦口谏诤于前，继以周恩来代表中共亲赴西安与蒋开诚相见，蒋终于答应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答应改组南京政府，刷新阵容。在改组新政府的名单中，拟定起用严立三来接替何应钦，担任军政部长这一要职（见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第二部分）。这显然是利用严的声望来应付中共，缓和舆论。实际上，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的仅一个月，蒋已经明令发表陈诚兼任军政部次长了。用严其名，扶陈其实，这就是蒋介石的“妙

用”。虽然后来蒋并没有实践改组政府的诺言，但到抗战发生之后，蒋移驻武汉之际，他再次想到了利用严立三的名望来掩护他对陈诚的扶植，达到他控制湖北的目的，还是这个老主意。这就是1938年6月改组湖北省政府，用陈诚兼领湖北省政的底蕴。

就严立三这方面看，他对蒋的为人是早已看透了。1940年夏，我随严先生赴重庆，住在湖北省政府驻渝办事处。有一个夜晚，严问我到渝以后的见闻和观感。我就闻见所及，如官场风习、文恬武嬉、通货膨胀、官僚资本等等，最后涉及蒋氏，正想发几句议论，严先生的脸色变得十分严肃，叹了一口气长气，说：

“不要说他了，在黄埔军校时，我同他坐在一起办公，朝夕相见，难道还不了解他吗？”没让我再说下去了。同年冬，严已辞退代理省主席职务。仍暂留居恩施。这时候，我应友人之约，决定去长沙从事新闻工作，正在等候便车，束装待发，向严辞行，严留我吃晚饭，向我讲治学方面的问题，讲到深夜十二点。他从《庄子天下篇》绪论中的原一、合二、贯三之旨讲起，讲到《礼记·大学篇》古本的错简问题，讲到朱熹的《大学章句》，王阳明的《传习录》和戴东原的《〈孟子〉字义疏证》，讲到经学究为何事，讲到中国古代学术的全体大用和立国根本以及世界学术思想的总归宿。当讲到《大学》的“三纲”和“八目”的统摄问题时，他深有感慨地说：“现在不是也有人正在讲《大学》《中庸》吗？自命为有知识，其实，是僭妄！是欺骗！”不言而喻，这显然是针对蒋在重庆“中央训练团”讲“大学中庸之道”而发的。因此可见严先生对蒋介石不怀好感。

严对陈诚的看法，却有所不同。1938年春，蒋决定在军委会设立政治部，并由陈诚兼任政治部部长。当时严向贺有年（时随严任民政厅秘书）说：“我的两个朋友，一个邓择生（邓演达别号择生），北伐时，当了政治部主任，失败了。一个陈辞修，现在也当了政治部长，不知将来又如何结局？”由此可见严还是

一如既往，视陈为友，对其前程，深表关怀。抗战开始，严先是希望陈诚一心带兵打仗，坚持抗战到底。严是为着共赴国难，参加抗战而出山的，既已回湖北，也未尝不希望 在湖北与陈诚合作，借重陈诚的支持，发抒自己报国的抱负。陈在蒋面前可以讲话，可以要钱，可以少受牵掣。陈在蒋系部队中有权威，从而可以争取军政的协调。这是战时推动省政的两个必要的条件。同时，严还想借重陈诚的力量，扶植几个湖北籍的黄埔学生，让他们在抗战中取得带兵打仗的机会，有所作为。

(二)

无可否认，陈诚早期在广东受过革命的熏陶，尤其是直接受过邓演达、严立三的影响。北伐时期，严立三任二十一师师长，是以军纪严明、作战勇敢著称的。严当时曾提出，要从人心的向背，看部队的纪律；从部队的纪律，看作战的能力，定军事的胜负。他还在所属官兵中提出“用人公开，经费公开，意见公开”的公约，并且以身作则，见之实行。举一个例说，当时二十一师的经理处长赵志益，就是陈诚推荐给他的。严离开二十一师时，师部结余款不下十万元，他洁身而去，分文无所取，都移交给了陈诚。在此身教言传的影响下，后来陈诚治军，是比较注重部队纪律的，比较注重军民关系的，在国民党部队将领中，算是略胜一筹。在公开场合，陈诚经常引用严立三的话，用以训勉部属。到了恩施，亲主省政，还是如此，不过，这时候已经变成他的口号了。他标榜廉洁政府，先后枪毙了几名贪污犯，其中有宜昌县长武长青，监利县长黄向荣，省粮政局恩施办事处主任陈国梁等人。武长青也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与陈有同学之谊。黄向荣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案发后，有几位黄埔同学替他奔走活动。陈国梁是省粮政局副局长陈楚栋的族弟，与民政厅长兼粮政局长朱怀冰有点瓜葛。具有这样背景后援的人，竟被绳之以法，

这在国民党贪污成风、官官相卫的情况下，不能不使人有“石破天惊”之感。誉之者说陈执法如山，大快人心；诋之者说陈杀鸡吓猴，不足为法；甚至还有少数个别人，说案情有出入，死的冤枉。但据我亲闻，先后主办这些案件的全省保安司令部军法科长曹秉哲和汪福东都说，经过了审判的，确实贪污有据。陈诚历来标榜自己不贪财好利，不蓄私产。谈及官吏贪污，往往怒目横眉，颇有必欲锄除而后快之概。他公开揭露过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早年在广州包揽市区粪便大发其财的臭史，他公开骂过孔祥熙。这时候，严立三、张难先都留在鄂西，石瑛任省临时议会会长，他们三位都是以廉洁无私，一介不取见称的，风范著于乡邦，典型近在咫尺。陈诚既然标榜廉洁政府，财政公开，也不得不有所表现了。

雷厉风行，严禁烟毒，这是战时湖北不同于他省的特点。实际上，这项政策措施，也是严立三发其先端，极力主张的。溯其原委，有一段故事：“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大公报》特派记者上庐山，访问严立三，随即发表了一篇专题报道，叙述了他的事迹，称之为“当代的严子陵”，旨在讽刺蒋介石历来排斥异己，国难当头，弃北伐名将于不用。这个报道，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共鸣，部分黄埔学生的扼腕。蒋的内幕人物陈布雷也乘机向蒋进言，劝蒋起用严立三以收拾人望。于是，在蒋的授意下，陈诚亲上庐山访严，代表蒋向严征询对于国事的意见，并请严到南京参加政府工作。严婉言谢绝了下山参政，但对如何挽救民族危机却讲了一些看法。首先，为政在于有容，要陈劝蒋宽宏大量，早日结束内战，团结各派力量，共同对付日本，恢复失地。同时，蒋如果决心抗日，就应当认真练兵，严禁烟毒。蒋获悉后，再次派陈上山，请严出任全国禁烟总监，严提出了几个条件，要蒋亲自发表文告，表明禁绝烟毒的决心，定期勒戒吸食鸦片，逾期，凡属吸、售、运、藏、种，一概以军法从事，处死无贷。陈诚听了，

深以为然，向蒋转奏。蒋说：“目前财政困难，不得不寓禁于征；西南几省，鞭长莫及；平津方面，日本浪人贩毒走私，更对付不了，想严禁也行不通。”于是，第三次派陈诚上庐山，请严出任军事训练总监。严深知蒋是决不会放手让他来练兵的，这仅是一种羁縻之计，终于谢绝了（事后不久，向胖佛上山访严，严向他讲了以上的经过。后来，向随严到恩施，在严代理省政府兼任建设厅长期间，用向为秘书，代行厅务，与我素常相见。1943年夏秋间，我与向相遇于衡阳，谈及严先生，向才举以相告）。

湖北省政府西迁后，严立三察及鄂西烟毒问题的严重，下决心禁烟。他到恩施毅然下令：“凡公教人员吸食鸦片者，按战时军法处死。”当时恩施县政府会计主任某吸毒成瘾，一经查获，验明属实，当即被判枪毙了。稍后，严代理省主席，即电令全省，规定“凡在省境内种、吸、售、运、藏鸦片者，一律按军法从事。”这项地方单行禁令，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部不同意，遇有这类上报案件即予驳复。司法部门同时表示反对，多方阻止。严氏顶住一切压力，最后以去就向蒋力争。在争执过程中，陈诚在重庆，出了力，讲了话，支持湖北方面严刑禁毒。1940年9月，陈诚到恩施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亲主省政，10月27日发出“酉感保民代电”，严令各县，从第二年元月1日起，凡是运烟、种烟、吸烟、卖烟、藏烟的，不分情节轻重，一律枪决。由于他的雷厉风行，谁也不敢含糊。后来王东原继任湖北省主席，也不便有所变动，萧规曹随，一直奉行到抗战胜利复员以后，才被停止。这件事，虽然稍嫌操切，而且仅能行于一省范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就当时湖北——尤其是鄂西的具体情况说，在转移社会风气，反击日寇推行毒化政策等方面，是起了好的作用的。

再说抗战时期的湖北联中，这件事也是导源于严，并且得到了张难先和石瑛的积极支持和始终关心。1938年6月湖北省政府